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基馬爾道路論*

邱士杰**

-
- I. 基馬爾道路的世界意義
 - II. 國共合作時期中共中央對基馬爾道路的討論
 - III. 國共分裂後快速退出中共視野的基馬爾道路論
 - IV. 各方對於基馬爾道路的後續評價
-

■ 摘 要

土耳其國父基馬爾 (Mustafa Kemal Atatürk) 領導的民族革命是二十世紀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實現獨立與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典範，因此中共曾試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復刻」土耳其的基馬爾道路，甚至評估基馬爾政權可能在國民黨排除中共的條件下獨自實現。但當蔣介石確實成立起沒有中共參與的國民黨政權，中共卻轉而認為國民黨政權只是中國前資本主義社會所決定的落後上層建築，沒有能力改造經濟基礎，因而也沒有能力推動任何類型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這不但使基馬爾道路論退出中國革命的舞台，更成為中共探索中國社會性質、重構革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2019年10月19-2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主辦之「第二屆海峽兩岸人文學論壇」(廈門)。感謝周展安教授與《比較中國研究》匿名審查人先後對本文提出的建議。

** 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 副教授
email: qiushijie@ntu.edu.tw

命論述的直接前提。

關鍵詞：基馬爾道路 民族資本主義 共產國際 第一次國共合作

■ Abstract

Kemalism during the First United Front Period of China

Qiu Shijie

(Xiamen University, China)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led by Mustafa Kemal Atatürk served as a model for achieving independence and developing national capitalism in the colon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nsequentl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ttempted to “replicate” Kemal’s road during the First United Front with the Kuomintang (KMT), even considering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Kemalist approach might succeed independently under conditions where the KMT’s anti-communist faction excluded the CPC. However, when Chiang Kai-shek eventually established a KMT regime without the CPC’s participation, the CPC shifted its view, regarding the KMT government as merely a backward superstructure determined by China’s pre-capitalist society, incapable of transforming the economic base or promoting any form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This shift not only led to the withdrawal of the Kemalism from China’s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but also set the groundwork for the CPC’s explor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ts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key word : Kemalism, National Capitalism, Comintern, First United Front

I. 基馬爾道路的世界意義：

從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論》的一則訂正談起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毛澤東選集》首篇論文的第一句話。¹⁾「敵／我／友」三分法是這句話的核心思想，著名的「中間地帶」論則是毛澤東對「敵／我／友」三分法的進一步論述。「中間地帶」指的是敵我之間的灰色地帶，即「友」。毛澤東日後提出的「第三世界論」即「中間地帶」論的升華和發揮。

「中間地帶」論蘊含的「敵／我／友」三分法貫穿毛澤東畢生的政治思考，但他對國際政治中的「敵／我／友」界定發生過變化。20世紀60年代中蘇分裂以前，毛澤東在1946年《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以及1961年《中間地帶國家的性質各不相同》的相關談話都指出敵人是資本帝國主義國家，「中間地帶」則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友軍，而中國要向社會主義陣營靠攏甚至成為其中的一部分。但在中蘇分裂之後，特別是1974年《關於三個世界劃分問題》的談話之後，毛澤東卻把中國算入「中間地帶」，以此區別於超強大國（蘇聯、美國）和次級大國（日本、歐洲、等等）。²⁾這樣的新看法也通過同年4月10日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關於「三個世界」的發言而傳播到國際場合。

毛澤東在1958年對《新民主主義論》提出的一處公開「訂正」是「中間地帶」論發生上述轉變的前兆。《新民主主義論》的1940年原版認為：當

1) 引文出自《毛澤東選集》所收《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修訂版。此文原文參見毛澤東(1989, 40)。

2) 毛澤東建國後關於中間地帶與三個世界劃分的上述談話，收錄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與中央檔案館(2011, 385)、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4, 487, 600)。

世界進入社會主義和資本帝國主義相對決的格局，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只能選邊站，因此中國不可能自外於兩者而獨立發展中國自己的民族資本主義。毛澤東的另一個根據則是近代土耳其的獨特歷史。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危在旦夕的二十世紀前二十年，基馬爾 (Mustafa Kemal Atatürk, 1881—1938, 又譯凱末爾) 領導全土耳其的民族運動，在一戰結束後擊退西方協約國勢力的侵略，並在1922年建立當時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區域少見的獨立的民族國家，即土耳其共和國。雖然穆斯林群眾是他的主要支持力量，他卻盡可能地弱化伊斯蘭對土耳其的影響，加強土耳其的世俗化，推動文字改革和婦女解放等新政，讓資本主義獲得長足的發展空間並維持國家的獨立，這一系列的貢獻讓基馬爾被土耳其共和國尊稱為「土耳其人之父」(Atatürk)。³⁾基馬爾道路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掌握政權並發展資本主義的經驗。面對這個歷史經驗，毛澤東特別強調這種貌似完全自主獨立的民族資本主義道路只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土耳其基馬爾政權手中實現，卻絕不可能在中國出現。⁴⁾然而毛澤東在1958年接見巴西記者馬羅金和杜特列夫人時修正了上述見解。他認為基馬爾道路確實在中國走不通，但1958年之際的世界格局還是可能讓曾經作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亞非拉國家——作為「中間地帶」的主要力量——走上民族資本主義之路：

我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不可能出現基馬爾式的土耳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要就跟帝國主義走，要就跟社會主義走，沒有第三種情況。事實上，這種觀點只適合於一部分國家，例如中國、土耳其。對於印度、印度尼西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等國家卻不適用。它們不是帝國主義國家，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

3) 基馬爾革命史與土耳其共和國的成立經緯可參見：咎濤(2011, 69-84)。

4)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1)，載竹內實(1983, 166)。

是民族主義國家。拉丁美洲有許多這樣的國家，將來還會多。……什麼事情都不能永久維持。帝國主義不能夠永久維持。社會主義也不能夠永久維持，因為還要進入更高級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三種立場可以維持相當的時期，維持到還有必要的時候。⁵⁾

毛澤東為了訂正「中間地帶」論而提及的土耳其基馬爾道路，其實是共產國際和中共創立初期的20世紀20年代曾經熱烈討論的一種民族資本主義發展路線，屬於當時的新生事物。而這種新生事物之所以引起馬克思主義者的關注，則是因為它補充了列寧確立的資本主義發展「類型論」思想。列寧認為，在沙皇俄國仍以農民經濟為主體、資本主義仍在發展的前提下，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並不是最可行的革命道路（實際上，這種辦法反而是當時主張維護農民經濟的民粹派所熱衷）。問題並不在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類型」。有的類型有利於人民大眾，有的類型反之。為了替隨後的社會主義革命創造前提，必須先用好的資本主義類型來取代類型不好的資本主義：

(1) 不利於人民大眾的類型以普魯士道路為代表。這條道路的特色是國家扶助既有的封建「容克」大地主，讓他們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地主經濟。這個過程保留大量的前資本主義殘餘，因而人民大眾將在剝削者轉化為資本家的過程中遭遇到最大的苦痛。⁶⁾

(2) 與普魯士道路非常接近的另一個例子是斯托雷平道路。代表俄國農奴主和地主利益的沙俄首相斯托雷平（П. А. Столыпин, 1862—1911）為避免1905年俄國革命重演，便竭盡全力，以最快速度在農民農業生活方面推行資產階

5) 毛澤東：《同巴西記者馬羅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談話》（1958.9.2.），載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1992，370—371）。

6) 列寧：《社會民主黨在1905—1907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1907），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1990a，204—208）。

級的政策……從俄國的新資產階級分子，特別從鄉村的俄國的新資產階級分子中間去尋找同盟者。斯托雷平企圖舊皮囊裡裝新酒，把舊的專制制度改造為資產階級君主制。」⁷⁾

(3) 有利於人民大眾的資本主義類型則是美國式道路。列寧認為這條道路的好處是國家以土地國有化的方式平分土地給農民，進而通過農民內部自然發生的階級分化而產生出農業資本主義。這個過程以各種前資本主義要素的完全鏟除——尤其是地主——為前提，因而被視為最徹底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⁸⁾列寧從美國式道路獲得啟發，提出由工農推動土地革命以實現類型最好的資本主義，進而為社會主義革命開闢道路。

基於資本主義存在不同類型的判斷，列寧在1920年的共產國際「二大」明確反對革命成功的落後地區保留已經存在的農業資本主義大生產：儘管大生產是資本主義，卻含有大量的前資本主義殘餘，與其期待以這種大生產在革命之後變為發展資本主義的基礎，不如直接將之推倒然後重建出類型更好的資本主義。⁹⁾

共產國際「二大」提出的《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決議》以及《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補充提綱》為分析新的資本主義類型——基馬爾道路——提供理論準備。前一份文件提出「共產國際應當同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達成臨時協議，甚至結成臨時聯盟，但是不要同他們融合，要絕對保持無產階級運動的獨立性，即使這一運動還處在最初的萌芽狀態也應如此。」¹⁰⁾後一份文件則說：殖民地與「從屬國」

7) 列寧：《斯托雷平與革命》（1911.10.18.），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1990b，325—333）。

8) 列寧：《社會民主黨在1905—1907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1907），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1990a，204—208）。

9) 關於列寧主張消滅革命前已經存在的資本主義大農業而引起的論爭，可參見村田陽一（1978，571—573）的介紹，並見列寧：《土地問題提綱初稿》（1920.6），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1990c，167—178）。

(即半殖民地)的共產主義者「為推翻外國資本主義，實現殖民地革命」，其第一步「不妨同資產階級民族革命分子進行合作」。雖然「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民族運動」試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實現政治上的獨立」，但當地共產主義者的「首要的任務是建立共產黨」並實現無產階級對民族運動的領導權。¹¹⁾

曼努伊爾斯基 (Д. З. Мануильский, 1883—1959)曾言：「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我們確定了年輕的共產主義支部對待即將掌權的資產階級民族解放運動的態度。但從那時起我們……遇到了新情況，即需要確定共產黨對待已經掌權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在土耳其，經過由基馬爾帕夏領導的反對外國軍隊的一系列革命解放戰爭之後，被運動的浪潮自下而上托舉起來的年輕的土耳其資產階級掌握了政權。」¹²⁾

共產國際「二大」前後是基馬爾政權尚未鞏固的階段，革命戰爭仍在進行。蘇維埃俄國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曾在1920年6月28日焦急地請求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答應給土耳其的武器援助必須立即提供」，否則會使「穆斯塔法·基馬爾政府把我們看成是說空話的人和騙子」。¹³⁾這個例子體現出當時的共產國際以「有保留的支持」對待基馬爾運動。

「二大」結束後召開的東方各族人民代表大會（1920年9月）仍以「有保留的支持」的原則分析土耳其革命。季諾維也夫承認「蘇維埃政府支持基馬爾」，但強調「我們一刻也不會忘記，基馬爾領導的運動不是共產主義運動。」非但如此，「基馬爾政府現在在土耳其的所作所為是支持蘇丹

10)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決議》，載戴隆斌（2012, 640）。

11)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補充提綱》，載戴隆斌（2012, 644）。

12) 《曼努伊爾斯基作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載戴隆斌（2015, 206）。

13) 《契切林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0.6.28.），載沈志華（2002, 409-410）。

的政權。」¹⁴⁾土耳其共產黨員穆圖舍夫則強調，「穆斯塔法·基馬爾運動是一種民族解放運動。我們支持這場運動，但是我們相信，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一結束，這場運動肯定會發展成為一種社會革命。」¹⁵⁾會上通過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告波斯、亞美尼亞和土耳其受奴役人民群眾書》提出既支持基馬爾但又要求民眾蓄積自身力量的號召，「即使〔基馬爾〕帕夏同協約國掠奪者媾和，你們也能繼續戰鬥。」¹⁶⁾土耳其共產黨代表蘇利曼—努里也在1921年的共產國際「三大」重申了類似態度。¹⁷⁾

「有保留的支持」態度在1922年共產國際「四大」結束。土耳其代表奧爾昌嚴厲譴責基馬爾「殘酷地迫害一切為工農謀幸福的人士」，「指控被逮捕的同志為蘇俄搞間諜活動，因而犯有叛國罪。……被捕的人數已經超過200人。」¹⁸⁾為此，這次大會發表《致土耳其共產黨人和勞動人民的公開信》譴責基馬爾對土耳其共產黨的鎮壓。¹⁹⁾諷刺的是，當基馬爾政權逐漸穩固，土耳其共產黨黨報竟出現建議共產黨支持民族資本發展、反對外國資本的文章。對此，曼努伊爾斯基在1924年共產國際「五大」批評土耳其共產黨從「國家生產力發展的利益與資本發展的利益融為一體」的角度分析現狀乃是「嚴重的錯誤」。²⁰⁾有意思的是：儘管共產國際在1922年「四大」和1924年「五大」先後批判了基馬爾政權，但在完全沒有共產國際代表大會的1923年——正如本文將接著指出的——基馬爾道路

14) 《季諾維也夫發表講話》，載陳新明（2015，427）。

15) 《穆圖舍夫（共產黨員）的發言》，載陳新明（2015，509）。

16)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告波斯、亞美尼亞和土耳其受奴役人民群眾書》，載陳新明（2015，395-396）。

17) 《蘇利曼—努里的發言》，載戴隆斌（2011，290—291）。

18) 《奧爾昌（土耳其）的發言》，載童建挺（2012，602—603）。

19) 《致土耳其共產黨人和勞動人民的公開信》，載童建挺（2012，604—606）。

20) 《曼努伊爾斯基作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載戴隆斌（2015，206）。

論卻在中國革命堂堂登場。

基馬爾取得政權之後對共產黨人與革命的背叛是土耳其革命給予共產國際最重要的教訓，然而共產國際和蘇維埃政府從未真正斷絕自己與基馬爾政權的關係。學者咎濤認為，這是因為「雙方對彼此都具有重要的利益關切」，「本就是相互利用的、基於利益的關係」（咎濤，2019，106-107）。此說固然有理，但也應該注意到共產國際始終沒有否定《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決議》以及《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補充提綱》。因此，扶助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從中獲取工人運動與共產黨發展契機，本就是《決議》和《補充提綱》必然產生的理論要求和道義責任。也因如此，國際對於基馬爾政權的批判並沒有進一步上升為批判基馬爾道路。這讓基馬爾道路在土耳其以外地區的持續推廣成為可能。換言之，當時出現了對已經成立的土耳其基馬爾「政權」和作為革命經驗的基馬爾「道路」進行區別評價的思想。由於當時的共產國際面對的土耳其已經建立起基馬爾政權，革命已經成功，因此也可將基馬爾政權視為基馬爾道路的重要經驗之一。就此而言，基馬爾道路的關鍵經驗不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如何通過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權，更重要的是政權建立之後如何維持初衷、堅持革命理想、推動經濟建設、建設民主國家，把原來設想的革命道路走到底，並在這種走到底的條件下為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發展提供空間——換句話說：為了鞏固政權也可能放棄資產階級革命的理想，向帝國主義勢力或「封建殘餘」妥協，而這就意味著基馬爾道路的實質失敗。寫作《新民主主義論》之際的毛澤東之所以認為二戰之後的世界局勢不容許基馬爾道路在各個殖民地半殖民地複製，其著眼點正在這裡。

II. 國共合作時期中共中央對基馬爾道路的討論

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論》的訂正其實是重新確認土耳其基馬爾政權及其道路的普遍性，換句話說，他始終承認基馬爾政權及其道路至少在土耳其取得了代表性的成功。然而這種想法也不是毛澤東所獨有的見解。實際上，對於土耳其經驗的肯定，是經歷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國共兩黨特別是中共中央領導人所共同擁有的思想。

土耳其的革命經驗是國共實現合作的媒介之一。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孫中山就稱自己領導的革命和同時期的少年土耳其運動「在精神和計劃方面和它完全相同。」²¹⁾十月革命後，土耳其的基馬爾革命也成為共產國際說服孫中山的一大理由：「眼下基馬爾的勝利就是俄國的勝利。經常可以聽到，俄國窮，無力助人。土耳其的情況就證明這種說法完全是錯誤的。首先應該把所有的民族主義力量聯合起來，然後依靠俄國的援助組織起來，順利地反抗資本主義列強。」²²⁾確定聯俄與國共合作之後，孫中山更大力讚美斯拉夫民族在俄國革命產生了「抑強扶弱，壓富濟貧」的思想，「專為世界上伸張公道打不平」；「土耳其在歐戰之前最貧最弱，不能振作……幾乎不能自存」，「後來俄國出來打不平，助他趕走希臘，修改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到了現在，土耳其雖然不能成世界上的頭等強國，但是已經成了歐洲的二三等國。這是靠什麼力量呢？是全靠俄國人的幫助。」²³⁾——近年有研究者指出：儘管孫中山決定了「聯俄」政策，但土耳其基馬爾政府不斷背叛共產國際的經驗卻導致共

21) 孫中山：《與檀香山〈太平洋商業廣告報〉記者的談話（譯文）》（1910.4.20），載尚明軒（2015a，127）。

22) 孫中山：《與格克爾等的談話（譯文）》（1922.9.26），載尚明軒（2015b，456）。

23) 孫中山：《民族主義的演說》（1924.1.13），載尚明軒（2015a，529）。這篇演說後來收入孫中山所著《三民主義》。

產國際只願以「既遲也少」的態度幫助孫中山。(羅福惠, 2000)顯然, 共產國際正是以「基馬爾第二」的角度評估孫中山和他的革命的。

土耳其的革命經驗也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中共亟欲效法的典範。建黨初期 (1920—1921)的中共本將社會主義革命設定為中國革命的直接目標。但在共產國際提出國共合作方針後, 1922年的中共「二大」便改以跨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作為第一階段, 而社會主義革命作為第二階段。親歷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鄭超麟 (1901—1998)回憶: 1923年的中共「三大」決定「全黨一致採取『國民革命』路線」, 「這個路線具體說來就是: 先把有名無實的中國民主政黨 (國民黨)充實起來, 擁護他奪得全國政權, 然後在它的統治底下準備我們自己的革命, 推翻它, 而取得政權。這是第三國際的路線或寧可說是俄國外交部的路線。俄國外交部把重心放在前一階段, 即如何將中國造成初期基馬爾式的土耳其, 或外蒙古人民共和國; 至於第二階段, 則不過是陪襯的, 並不重視。」(鄭超麟, 2004, 243)

揆諸史料, 基馬爾道路論確實是中共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相當濃厚的運動傾向。首先, 中共中央主辦的《嚮導》、《新青年》、《中國青年》、《前鋒》等刊物都在國共合作確立之後發表許多贊頌土耳其革命經驗或介紹其近況的論文, 特別是早期中共領導人蔡和森 (1895—1931)等人贊揚土耳其革命的系列文章。旅歐期間的周恩來在其《革命救國論》甚至將土耳其革命和俄國革命相提並論: 「只要弱小民族的國民力量勝過一時的侵略者, 無產階級的團結力勝過當時的統治者, 則一個革命的爆發, 也成了自然之勢。前者的例子是土耳其, 後者便是俄羅斯。而俄、土在土耳其國民運動中的相互關係, 更足證明全世界被壓迫階級實有聯合的必要和可能, 且世界革命的偉大工作, 也正要在這個聯合中期待實現。」(清華大學中共黨史教研組, 1981, 321-322)

除了直接歌頌土耳其基馬爾革命的實際經驗之外, 基馬爾道路的

核心內容——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政權——也在1923年得到當時領導中共的陳獨秀（1879—1942）的明確說明：

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狀況既然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這革命運動中；革命黨便須取得資產階級充分的援助……因此，我們以為中國國民黨應該明白覺悟負了中國歷史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使命。（獨秀[陳獨秀]. 1923a, 163）

其次：

在普通形勢之下，國民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但彼時若有特殊的環境，也許有新的變化，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干政權，乃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勢而決定。1917年俄羅斯的革命就是一個好例。（獨秀[陳獨秀]. 1923b, 6）

蔡和森認為陳獨秀的見解是「認革命勝利一定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以為國民革命成功後，要經過一長期的資本主義發展才有社會革命之需要與可能」。（和森[蔡和森]. 1928, 22）但在日後和陳獨秀一同走上托洛茨基主義道路的鄭超麟眼裡，「中國共產黨，至少它的領袖陳獨秀，接受這個路線時，恰恰是把重心放在第二階段」。（鄭超麟. 2004a, 243）

蔡和森與鄭超麟的評價看似相反，卻蘊含共同的追問，即「國民黨奪取全國政權之後中共是否參與權力的分享」。然而，在國民黨奪取全國政權之前，早已存在國民黨所代表的黨權、廣州和武漢國民政先後所代表的政權，以及國民革命軍的軍權，因此最要緊的問題其實是共產黨在「國民黨奪取全國政權之前」如何分配這些既有權力。對於這個問題的經典回答來自彭述之（1895—1983）在1924年底提出的「無產階級天然領導權論」。彭述之認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固然都參加國民革命，但資產階級沒辦法堅決反帝反封建，必然逐漸流向反革命陣營，因此「革

命領導權」——即對前述各種權力的把握——必在「天然」具有「革命性與覺悟力」的無產階級手中。此即著名的「無產階級天然領導權論」。(彭述之. 1924)由於此論「得著黨內高級幹部之注意」,²⁴⁾便促使1925年召開的中共「四大」據此形成《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鄭超麟認為「這個無產階級天然領導國民革命論，正投合中國同志胃口，成為那幾年黨內指導的理論。上海區委、湖南區委、北方區委，以及山東、河南等處，都與上海中央一個傾向。」(鄭超麟. 2004a, 224)但如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一文所言，「彭述之認為領導權是天然地落到了無產階級身上……不用無產階級去爭。這就是沒有看到資產階級在爭領導權」。(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 1983, 159)

周恩來所說的資產階級首先是指國民黨內的反共派。他們對權力的爭奪始於1925年底形成的「西山會議派」，但沒有立即產生作用。1926年3月突發的「中山艦事件」讓蔣介石奪取更多國民革命軍的軍權，限制了中共對部隊的影響。然而，國民革命軍的軍事行動在湖南、廣東等省份刺激起大規模農民運動，²⁵⁾這些運動又反過來為共產黨在爭奪中的黨權、軍權、政權之外增加全新的權力領域——即以平均地權為代表的「民權」——而且這是國民黨內反共派尚未介入的領域。除了農民運動之外，中共進一步在1926至1927年間的上海連續發動三次工人武裝起義。諷刺的是，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卻成為中共主動實踐基馬爾道路的場域。中共中央層級的公開史料不易看出這種傾向，但作為內部史料刊行的《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收錄的《上海區委關於上海第一次武裝暴動的總結報告》(1926.11.24)卻明確指出：

24) 瞿秋白：《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口頭報告）》（1928.6.20），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與中央檔案館（2015, 322）。

25) 可參見王奇生（2013）關於北伐的武裝鬥爭刺激了各地農民運動的分析。

在上海建立一個相當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府，使工人階級可以從中取得相當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權，以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行動上仍拉資產階級為主體。(中央檔案館與上海市檔案館, 1986, 33-38)

面對國民黨內反共派勢頭漸長，而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竟企圖主動造成一個資產階級領導的基馬爾政權的新局面，1926年12月召開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以下簡稱共產國際「七全」）重新定義了基馬爾道路對於中國革命的意義。會議由布哈林（Н. И. Бухарин, 1888—1938）主導，並由他和印度共產主義者羅易（M. N. Roy, 1887—1954）起草中國問題議決案。隨後，羅易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在1927年前往中國落實議決案的精神，但沒能阻止上海「4.12政變」的發生。羅易將議決案的思想貫徹在1927年4至5月的中共「五大」，並獲瞿秋白（1899—1935）支持，直到武漢「7.15分共」，羅易赴華使命宣告失敗。

「民族資本（民族資產階級）- 外國資本（帝國主義）- 本地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三角框架是布哈林與羅易分析中國革命前途的基本假設。依據《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1926.12.1），布哈林判斷民族資產階級很可能獨自取得國民革命的「勝利」，取得政權、開放中國市場、吸引外國資本，就算日美英三國資本依據各自優勢瓜分中國，也將和平而穩定，甚至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穩定的正面因素；另一方面，共產黨也可能「在中國失去農民」，即民族資產階級很可能平均農村地權，使本地的前資本主義社會發生根本變革。——據此，布哈林推測共產國際將「只能與『進步的』資本主義發展打交道」。(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1994, 20-21)而「進步的資本主義發展」正是基馬爾道路。羅易則在中共「五大」發表的報告即《中國革命的前途和性質》（1927.5.4）補充：這將是「循著資產階級民主道路發展的前途。這個前途意味著開始一個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統治下的資本主義

發展時期，也意味著中國革命的失敗。」(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與中央檔案館. 2015,73-74)

外國資本促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實現資本主義化的見解可能來自羅易。羅易參與共產國際的著名事蹟是列寧讓他針對民族和殖民地問題起草《補充提綱》，²⁶⁾而他最出名的思想則是1920年代中期分析印度經濟而總結的「非殖民地化理論」(theory of decolonization)。羅易認為印度在英國資本主義的長期滲透之下已經發展起自己的工業，出現資本主義特有的「資本家／工人階級」的兩極分化。加上當時以「不合作運動」為代表的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促使英國殖民當局採取「促進經濟＋政治高壓」的兩手策略，從而使印度得以逐步資本主義化。²⁷⁾

為狙殺基馬爾道路，《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主張中共應該以「非資本主義前途」作為「我們的總方針」，即：「建設一個具有反帝內容、工業實行國有化、土地實行國有化、廣泛吸收群眾參加國家機關、對外貿易實行壟斷、廢除國債、中蘇結盟、中國和西歐無產階級結盟的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國家。在這個基礎上，國家才能相當長期地維持下去。」但他認為這種政權有兩種可能的前途：如果政權能把「國有工業即經濟命脈掌握在自己手裡」，便能強化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因素，反之，則「只能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1994, 17-20)羅易在中共「五大」發表的《非資本主義發展和社會主義，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

26) 此文由羅易起草後，經列寧加筆修改而成 (村田陽一. 1978, 574-576)。

27) 可著重參見羅易在1922年所撰《轉型中的印度 (Indian in Transition)》(Roy. 1987, 183-376)與1926年所撰《印度政治的未來 (The Future of Indian Politics)》(Roy. 1988, 451-534)。特別是後一篇論文所收錄的「帝國主義的新經濟政策」(The New Economic Policy of Imperialism)一節。對於羅易「非殖民地化理論」的相關研究和文獻回顧請參見中村雅秀 (2000, 159-187)。

(1927.5.5)進一步指出：「非資本主義前途」的特色是以「資本主義方法」提高「社會主義所要具備的那種經濟發展水平」，但又「不需要以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為基礎」。(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與中央檔案館，2015，79)

兩種前途由誰勝出？布哈林推測：「我們」已經在中國擁有了自己的革命政府（武漢國民政府）、革命軍隊，以及革命地區，中國要想走上基馬爾道路可謂「異常困難」。土耳其共產黨代表費爾迪則推測基馬爾道路還沒耗盡進步性，「中國革命在勝利之前將朝著土耳其革命發展的方向發展」。²⁸⁾

基於以上討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1926.11)形成以下方針：(1)中共應爭取中國革命的「非資本主義前途」；(2)發動土地革命，爭取「革命領袖權 (Hegemony)」；(3)排除國民黨內的資產階級，將國民黨改造成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4)中共參加國民政府；(5)批判中共試圖在上海第一次暴動期間主動造成一個基馬爾政權；(6)批判彭述之的天然領導權論。(中央檔案館，1989a，666—682)

直到1927年「4.12政變」前夕，陳獨秀仍在公開場合強調中國革命將止於國民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²⁹⁾但中共內部已試圖糾正方向：不但加強黨對工會的絕對領導，³⁰⁾更強調奪取政權。《上海區委關於上海市民會議運動的指示——反對市民會議的理由與實現的可能》(1927.4)指出：

說上海工人階級此刻還不能作爭政權的運動，上海政治在現時只能建立一個「相當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府，使工人階級可以從中取得相

28) 《費爾迪 (土耳其) 的發言》，載邢艷琦 (2013，368-369)。

29) 具體參見：陳獨秀：《陳獨秀關於國民黨問題報告》(1926.11.4)，載中央檔案館 (1989a，422—431)；陳獨秀：《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1927.4.5)，載中央檔案館 (1989b，593-594)。

30) 參見周家彬與陳奧 (2021)關於中共上海區委強化領導工會的近期研究。

當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以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或者把上海工人的鬥爭「放開政權，專只注意擴大反帝運動，希望從這個運動中強固自身組織而爭得政治上地位」；說市民代表會議的運動得不著工人以外其他階級的同情，這都是錯的。……我們一面要反對帝國主義，一面也要爭取政權，而且只有政權越離開右派，越能保證反帝運動之繼續和深入。(中央檔案館與上海市檔案館. 1986, 430)

儘管國際和中共努力避免中國革命失敗，卻始終不脫離國民黨，此舉引來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在「4.12政變」前的4月3日和隨後15日的強烈批判：「如果中國革命在其今天的民族資產階級領導下取得勝利，它很快就會糾正自己，證明自己對資本主義國家是可靠的，很快就會爭取讓它們承認自己，在新的基礎上提供租界、獲得貸款，總之，進入不那麼屈辱、少些殖民地色彩的資本主義國家體系，但仍是深度的附庸國。在這種情況下，中華民國對蘇聯的立場，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國的立場。」「基馬爾主義不再是民族革命運動，不再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分支」，「把現在的國民黨比作1920年的基馬爾的黨，更加準確。在那時，基馬爾的黨努力擺出革命黨的樣子……但時機一到，它就宣佈共產黨為非法」，因此中共應立即完全與國民黨分離，否則國民黨內反共派將「像基馬爾·帕沙一樣殘酷地把工人階級先鋒隊消滅」。(施用勤. 2011, 22, 165, 169, 183)儘管托、季兩人的看法沒有馬上傳到中國革命現場，卻在國共分裂之後成為陳獨秀等革命者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關鍵的思想資源。

III. 國共分裂後快速退出中共視野的基馬爾道路論

第一次國共合作在1927年武漢「7.15分共」之後結束，並在次月的

「八七會議」確立起獨立自主的革命路線。與此相應，共產國際與中共也不再從基馬爾道路的角度評估國民黨及其政權的前景。從「民族資本 - 外國資本 - 本地前資本主義社會」三角框架來看，基馬爾道路論的要旨是民族資本將作為獨立的主導因素而積極吸收外國資本，並促使本地前資本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 (transition)，但八七會議之後對於獨立主導因素的指認，卻逐漸從民族資本轉移到本地前資本主義社會。

首先是八七會議之後立即出現的普魯士道路論。中共中央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議決案》(1927.8.21)指出民族資本將與三角框架中的另外兩個因素妥協，走上普魯士道路，但比「前一世紀的普魯士更加要受阻礙」。(中央檔案館. 1989b, 327—342)幾個月後，《中國共產黨土地問題黨綱草案》(1927.11.28)進一步從亞細亞生產方式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 界定中國本地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認為外國資本對於這種本地社會的入侵，導致「崩潰的舊中國社會」以「非常遲滯痛苦的轉入新式的資本主義制度」。(立夫. 1927)

其次則是王明的老師米夫 (П. А. Миф, 1901—1939) 在1927年12月的聯共 (布) 十五次代表會議提出的斯托雷平道路論。其基本邏輯與普魯士道路論一致，只是他更強調中國資本主義將在更艱難的環境即「中國地主 - 資產階級的斯托雷平反動統治時期」中發展。(王福曾. 1986, 48)

其三則是羅明納茲 (В В Ломинадзе, 1897—1935) 提出的資本主義發展不可能論。羅明納茲是國共合作破裂之後接替羅易前往中國挽救革命的共產國際代表，並在他的主持之下推動八七會議的召開。雖然前面提到的普魯士道路論正是他赴華期間推出的觀點，但羅明納茲本人卻有不同的見解。他在1928年2月發表的《中國革命的新階段和中國共產黨人的任務》指出：本地前資本主義社會就算遭到外國資本入侵也仍然是三角框架內部的主導因素，而且中國社會根本不存在民族資本。或者說，中國資本家不過是「中國社會中最不成熟、落後的階級，它還沒有

度過中國舊社會的嬰兒時期」，因此實際上「還沒來得及定型為中國社會的獨立階級」，而只是零星軟弱的個人或集團。正因如此，他們在國共合作失敗之後迅速匯合到國民革命原欲推翻的舊勢力（即以「地主」、「封建」、「軍閥」、「買辦」等概念描述的那個陣營），而中國資本家與舊勢力的野合只會導致中國分化出幾股分庭抗禮的軍閥集團，彼此內戰，因此，中國不可能出現統一的政權遑論統一的資產階級政權，從而也不可能在資產階級政權的領導下幫助中國走上任何形式的資本主義道路。只要革命不成功，就只能淪為殖民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2002，75）³¹⁾

羅明納茲的上述觀點在聯共（布）十五次代表會議引起與會者特別是斯大林的強烈質疑。根據目前只有俄文版的《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XV Съезд Вкп(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就在羅明納茲把中國資產階級批評一通時，台下有人喊道：

你說過頭了。

羅明納茲應曰：

一點也不過份。我可以舉出大量具體材料來證明這點。國民黨過去是幾個革命階級的集團。但在政變之後國民黨已不再是革命力量，甚至也無法再作為一個政治黨派而存在。……國民黨已經再也不是一個政治黨派了。

斯大林接著提問：

所以資產階級剩下什麼？

羅明納茲答曰：

資產階級剩下的只是某些資產階級份子（От буржуазии остались отдельные буржуа）。（笑聲）

31) 並請參見小竹一彰（1986）對羅明納茲思想的概要介紹。

質疑羅明納茲的聲音：

不是一個資產階級嗎？

羅明納茲改口：

剩下的是一些零星的資產階級的集團（Остались отдельные группы буржуазии）……。³²⁾

米夫也進一步在1928年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擴大全會批判了羅明納茲。他在會上發表的《中國革命的幾個爭論問題》仍然堅持自己的斯托雷平道路論，但他進一步強調：就算中國變成殖民地（這是羅明納茲的見解），也還是會因為外國資本而實現痛苦的資本主義化。（王福曾，1986，59-60）面對羅明納茲與米夫的爭論，與會的向忠發（1879—1931）以模稜兩可的態度同時批評了兩人。³³⁾

顯然，面對國民黨建立起自己的政權的新局面，各方意見分歧，這便成為1928年中共「六大」所要直接解決的問題。如前所述，列寧以來的資本主義發展「類型論」可分為美國式道路（平分土地的農民內部發生資本主義兩極分化）、普魯士道路和斯托雷平道路（前近代的土地菁英轉化為近代資本家）、基馬爾道路（通過反帝革命推動民族資本主義），以及非殖民地化理論（外國資本促使殖民地資本主義化）。中共「六大」前夕，匈牙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瓦爾加（E. Varga，1879—1964）草擬的《中國共產黨綱領草案初稿》直接否定了中國走基馬爾道路的可能性，因為「資產階級的土地革命在中國是不可能的，因此會帶來民族資產階級專政的資產階級革命（像在日本、土耳其那樣）也是不可能的。」³⁴⁾雖然中共「六

32) XV Съезд ВКП(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осква – Ленинград: Госиздат, 1928, с. 664.

33) 向忠發：《在共產國際第九次擴大全會上所作的總結報告（第六次會議）（1928.2）》，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與中央檔案館（2015，19）。

大」並沒有採用瓦爾加草案，但瓦爾加所否定的基馬爾道路卻直接成為「六大」不予討論的選項。作為「六大」委託的土地綱領起草代表，李立三（1899—1967）進一步在《關於農民土地問題的報告》（1928.7.1）向大會分析了非殖民地化理論、普魯士道路與斯托雷平道路不可能在中國實現的理由。實際上李立三並沒有使用非殖民地化理論這個術語，但他涉及了這個術語所指涉的內容，即外國資本能否使中國農村資本主義化的問題。他認為中國革命勢力的存在將阻止外國資本對農村的滲透，因而此路不通。此外，他主要從中國農村已經存在的經營地主（也就是直接具有資本家身分的地主）去分析普魯士道路和斯托雷平道路的可能性，但他認為，只要佃農沒辦法轉化為雇農、只要地主無法獲得足夠的資本以購置機械，這類道路就走不通。最後，李立三承認中國農村已經出現「富農／貧農與雇農」的資本主義兩極分化，但他認為當時的中國只有資本主義的消極方面可以發展，而積極方面難以展開，因此富農只會變成外國資本向中國農村吸血的媒介，不會長成獨立的資產階級。——李立三的結論是中國只有走美國式道路才有前途，而共產黨領導土地革命，就是為美國式道路開闢道路，「客觀上是在力爭農業經濟的資本主義發展」、「使自由的農民變成資本主義式的小農經濟」，並允許土地革命之後的農村出現「富農／貧農與雇農」的兩極分化。（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與中央檔案館，2015，421）

IV. 各方對於基馬爾道路의 後續評價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破裂以及土耳其基馬爾政權的背叛，讓基馬爾

34) 瓦爾加：《瓦爾加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綱領草案初稿（1928.4.7）》，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與中央檔案館（2015，28）。

道路遭到共產國際許多論者的批判。首先是土耳其代表法赫里在1928年共產國際「六大」的譴責。他認為土耳其的基馬爾政權已經成為帝國主義支配土耳其的幫凶，「被迫走上了背叛維護國家獨立事業的道路」，而且基馬爾政權「沒有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務和解決民族問題，半封建殘餘等依然存在」因此，只要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沒有走上社會主義——比方土耳其——就會「慢慢地再次變成半殖民地國家」。³⁵⁾其次則是芬蘭革命家庫西寧 (O. W. Kuusinen, 1881—1964) 在1929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的觀點：「一切有關中國『平靜的』『基馬爾式的』發展前途的說法，都是無聊的廢話。」³⁶⁾土耳其共產黨的費爾迪甚至在1931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同時概括了中國與土耳其的失敗經驗：「如果現在能夠將鬥爭重新再來一次，可以肯定，安納托利亞的農民絕對不會跟著基馬爾的資產階級走了。國民黨在中國的無恥背叛，蔣介石和其他殺人的將軍為了帝國主義的利益對成千上萬中國革命者的殘害，加上土耳其所發生的事件，完全擦亮了反對帝國主義的被壓迫勞動群眾的眼睛。」³⁷⁾

諷刺的是，土耳其還是想辦法向蘇聯求取援助。「基馬爾主義者也想按照蘇聯的樣式來實行計劃經濟，為此還邀請了蘇聯專家到他們那裡去。」³⁸⁾費爾迪甚至評價：「基馬爾主義者充分認識到，土耳其的獨立取決於蘇維埃國家的存在和友誼，否則他們不能對抗帝國主義資本重新奴役土耳其的奸詐圖謀。這便是安卡拉即使在耍花招以求得某個帝國主義強國垂青時也仍忠於蘇聯的秘密所在。」³⁹⁾

35) 《法赫里 (土耳其) 的發言》，載戴隆斌 (2013, 441—447)。

36) 《庫西寧同志作關於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的任務的報告》，載陳新明 (2012, 36)。

37) 《費爾迪 (土耳其) 的發言》，載邢艷琦 (2015, 132—133)。

38) 《庫西寧同志作關於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各支部的任務的報告》，載姚穎 (2012, 23)。

39) 《費爾迪 (土耳其) 的發言》，載戴隆斌與魯慎 (2015, 540)。

雖然共產國際與中共都放棄了基馬爾道路，但這條道路卻成為中國其他政治力量試圖效法或討論的對象。

首先是國民黨內的反共派。「4.12政變」之後，國民黨《中央半月刊》刊文指出：「孫總理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中，關於弱小民族聯合俄國革命求得獨立自由……只極力稱贊土耳其，頌揚他能聯俄革命，求得自己的解放。至於他的驅共政策，一語也不提及，這就是他意外的暗示。」「所以吳稚輝先生更說，總理教我們學土耳其，蘇俄共產黨好比狐狸精，引人入勝，使人上他的當。鑽到人的肚子內去，令人解脫不得。但是土耳其斷然地把他趕走了。」（遺生，1927，27）吳稚輝對「學土耳其」的提倡尤其值得注意，因為他是國民黨內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這說明許多反共派別都在「4.12政變」後注意到基馬爾的反共履歷是可以利用的外國經驗。——若先不論國民黨政權「學土耳其」的實際程度，至少陳獨秀為首的托洛茨基派傾向以基馬爾政權來定性「4.12政變」後的國民黨政權。在托派來看，國民黨政權是「資產階級新政權」，而1929年3至6月的蔣桂戰爭是「資產階級新政權之內部衝突，從而和國民黨從前對北方封建軍閥戰爭有不同的性質」。（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1929，92-96）社會性質論戰中的托派陣地《動力》在1930年9月撰文介紹「資產階級的基馬爾政府一般的經濟政策及其對於帝國主義之妥協的傾向」，實際上是論證基馬爾對資本主義的推動，藉以暗示國民黨政權也正在「與帝國主義妥協」的條件下推動中國的資本主義化。（丹齊各，1930，40）

其次是國家主義者。周恩來曾在1951年《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一文評價近代中國的國家主義運動最後做了國民黨的尾巴。「這個尾巴做得也很可憐，因為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環境裡，不可能出現土耳其式的基馬爾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在中國是行不通的。」收錄此文的《周恩來選集》注曰：「基馬爾主義是以基馬爾為代表的、主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思潮。中國一些資產階級分子在

1927年革命失敗後曾高唱基馬爾主義，企圖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1984，63，489)

基馬爾主義的最後回聲是1933年11月在福建福州爆發的「閩變」。事變參與者胡秋原(1910—2004)對前來採訪的記者伊羅生(H. R. Isaacs，1910—1986)說，他們起義的「榜樣不是蘇聯而是土爾其」，但基馬爾道路最重視的資產階級無法成為這條道路的主體，因為「這個責任落到旁的階級身上了，這是些什麼旁的階級我現在不能說，不過我們認為民族革命一定也是要轉變到社會革命去的」——領導事變的陳銘樞(1889—1965)強調胡秋原「的談話可以百分之九十代表我[陳銘樞]的意見！」(伊羅生，1933，8-9)可見胡秋原上述言論的代表性。閩變份子的行動恰恰反映國民黨政權並沒有走上他們心目中的基馬爾道路，然而閩變也沒有實現這條道路。不如說，他們以自身的實踐宣告基馬爾主義在中國的結束。

V. 結語：「中間地帶」民族資本主義的可能與不可能

「在資本的簡單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著資本的文明化趨勢」⁴⁰⁾——這是馬克思從英國資本對殖民地印度的同化而得出的論點。但在近代中國，除了羅易提出的「非殖民地化理論」，幾乎沒有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外國資本能幫助中國走向資本主義。近代中國存在的問題意識，是具有主權國家外觀的半殖民地中國能否依靠執政當局而資本主義化，而這個追問在20世紀20年代的基馬爾道路論獲得集中表現。由於1920年代

40)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前半部分]》，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2003，395)。

的中國大革命在國共實現合作之後便先後成立廣州國民政府以及武漢國民政府，因此，幾乎在革命剛「啟動」（或者革命「尚未成功」）的時候，國共合作就獲得了基馬爾道路最基本的外觀：政權。但就廣州與武漢國民政府現實中沒有發動諸如土地革命之類的社會改革措施而言，又與理想中的民族資產階級政權相去甚遠。然而，現實與理想在國共合作中出現的差距，其實也是土耳其的基馬爾政權所共享的問題。就此而言，基馬爾道路不但包含以革命去取得政權的經驗，還包含了取得政權之後能否繼續推動革命以保持政權的經驗。從取得與保持政權的角度來說，兩個經驗是連貫的；但從取得政權的時候側重軍事鬥爭而保持政權的時候必須側重經濟建設，則兩個經驗又是斷裂的。

正因如此，國共分裂後，排除了中共的南京國民政府能否保持自身政權、讓自己成為一個足以改造中國社會的民族資產階級政權並推動中國資本主義化，就成為中共與共產國際在1927至1928年間積極討論的問題。中共「六大」對此提出總結性的判斷：南京國民政府無法帶領中國走上基馬爾道路、無法給中國帶來有效的經濟建設與民主政治、無法推動中國的資本主義化。因此，當中共在國共分裂之後否定基馬爾道路在中國的可能性，就表示他們眼中的民族資本非但難以藉由建立民族資產階級政權而「同化」本地的前資本主義社會，反而可能與這種社會妥協，甚至是這種社會所決定的落後存在，被這種社會反過來「同化」。這不但重新回到馬克思著名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公式，也要求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具體分析當時的經濟基礎——本地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特質，這正是中國社會性質等論戰發生的原因。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則是中共方面論者對此特質的定論。

國民黨政權無力改造中國經濟的一般感覺可從旅日歷史學家戴國輝（1931—2001）對瞿秋白和尾崎秀實（1901—1944）的比較說起。在他看來，兩人都是被捕而犧牲的左翼烈士，但尾崎面對的是強大的天皇制國家，因

此他必須以參與蘇聯佐爾格諜報團的方式才能顛覆體制；即便被捕入獄，他也採取了積極「鬥爭」和「要活下去」的態度對抗「強力的體制之敵」。相較之下，瞿秋白死前只覺得國民黨是「附著於『半封建半殖民地』體制上的附庸」，不足為懼，因而他樂於就此「休息」（赴死）。（戴國輝，2011）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基馬爾道路論以及毛澤東的評價（與再評價）具有深遠的意義。一方面，1958年以後的毛澤東認為亞非拉「中間地帶」民族主義國家仍然——如1920年代的土耳其那樣——有可能走上基馬爾道路，顛倒了他此前對基馬爾道路適用範圍的縮限；但另一方面，他眼中必然走不了基馬爾道路的國民黨政權卻在1949年退居台灣之後開始推動經濟建設。儘管國民黨政權推動台灣經建的歷程、條件以及成果都仍在論爭之中，但只要考慮到1949年後的國民黨政權在冷戰體制下藉由依附美國與日本而讓台灣在1980年代以「NIEs」之姿登上世界經濟舞台，而「中間地帶」民族主義國家卻鮮少獲得類似的經建成果，便可發現，基馬爾道路所標舉的民族資本主義道路，因為冷戰體制（在海峽兩岸則還包含了內戰體制）而遭到割裂：如果堅持中間地帶國家所高舉的民族主義道路，資本主義就發展不良；但若如台灣之類的NIEs地區那樣堅持資本主義發展，則民族主義必須讓步（此處甚至應將冷戰期間的韓國發展經驗納入比較）。就此而言，強調二者相結合的基馬爾道路——在共產國際和中共的想像中——毋寧是一種連土耳其革命都沒能達到的理想形象，但其形象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後的破滅，卻成為中國共產黨探索自主革命道路的起點。

투고일: 2024.11.10. 심사완료일: 2024.12.24. 게재확정일: 2024.12.30.

| 참고문헌 |

1. 檔案文獻

XV Съезд ВКП(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Госиздат, 192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與中央檔案館. 2011,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1921-1949)* (第23冊),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沈志華. 2002, *蘇聯歷史檔案選編* (第1卷),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中央檔案館與上海市檔案館. 1986, *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甲種本): 中共上海區委文件 (1926年-1927年)*, 中央檔案館與上海市檔案館.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1994, *聯共 (布) 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 (1926-1927) (下)*,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2002, *共產國際, 聯共 (布) 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 (1927-1931) (上)*,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與中央檔案館. 2015,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與中央檔案館. 2015,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 (上卷)*,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中央檔案館. 1989a,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公開本) (第2冊)*, 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中央檔案館. 1989b,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公開本) (第3冊)*, 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 1929, *中國革命與機會主義*, 上海: 民志書局.

村田陽一. 1978, *コミンテルン資料集* (第1卷), 東京: 大月書店.

毛澤東. 1989,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1925.12.1)”, *黨的文獻* 1989(1), pp.40-45.

清華大學中共黨史教研組. 1981, *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 (第3冊), 北京: 北京出版社.

戴隆斌. 2011,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 (第32卷),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戴隆斌. 2012,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 (第30卷),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戴隆斌. 2013,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 (第47卷),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戴隆斌. 2015,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 (第38卷),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戴隆斌與魯慎. 2015,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 (第55卷),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童建挺. 2012,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 (第34卷),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陳新明. 2012,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 (第49卷),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陳新明. 2015,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 (第36卷),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邢艷琦. 2013,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 (第43卷),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邢艷琦. 2015,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 (第52卷),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姚穎. 2012,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 (第53卷),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2. 人物文集與回憶錄

Roy, Manbendra Nath. 1987, *Selected Works of M.N. Roy*, I, ed. by Sibnarayan Ray, Delh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y, Manbendra Nath. 1988, *Selected Works of M.N. Roy*, II, ed. by Sibnarayan Ray, Delh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 1983, *周恩來選集* (上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 1984, *周恩來選集* (下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1990a, *列寧全集* (第16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1990b, *列寧全集* (第20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1990c, *列寧全集* (第39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200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199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7冊),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1994, *毛澤東外交文選*,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王福曾. 1986, *米夫關於中國革命言論*, 人民出版社: 北京.

竹內實. 1983, *毛澤東集* (第7冊), 東京: 蒼蒼社.

尚明軒. 2015a, *孫中山全集* (第7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尚明軒. 2015b, *孫中山全集* (第8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施用勤. 2011, *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 (1925-1927)*, 西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

鄭超麟. 2004a, *鄭超麟回憶錄* (上), 北京: 東方出版社.

鄭超麟. 2004b, *鄭超麟回憶錄* (下), 北京: 東方出版社.

3. 民國報刊

丹齊各. 1930, “現代土耳其的經濟狀況”, *動力*1(2), pp.1-40.

立夫. 1927, “中國共產黨土地問題黨綱草案 (1927.11.28)”, *布爾塞維克*1(6), pp.153-165.

伊羅生. 1933, “在福建所見的「激烈」辭句與實地狀況”, *中國論壇*3(3), pp.1-12 (中文部分的頁碼)。

和森[蔡和森]. 1928, “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 *布爾塞維克*2(1), pp.17-33.

彭述之. 1924, “誰是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者”, *新青年季刊*4, pp.1-15.

獨秀[陳獨秀]. 1923a, “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 (1923.4.25發表)”, *嚮導周報*22, pp.162-164 (合訂本頁碼)。

獨秀[陳獨秀]. 1923b, “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 *前鋒*1(2), pp.2-10.

遺生. 1927, “中國革命之路——孫總理教我們學土耳其”, *中央半月刊*1(2), pp.15-28.

4. 研究專著與論文

小竹一彰. 1986, “ロミナーゼの中国革命論——「アジア的生産様式論争」との関連における紹介”, *近代中国研究彙報*1986(8), pp.13-22.

中村雅秀. 2000, *帝國主義と資本の輸出: パクス・ブリタニカの盛衰とアジア*, 京都: ミネルヴァ書房.

王奇生. 2013, “革命的底層動員: 中共早期農民運動的動員參與機制”, 載徐

秀麗與王先明. *中國近代鄉村的危機與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pp.273-309.

咎濤. 2011, *現代國家與民族建構：20世紀前期土耳其民族主義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咎濤. 2019, “全球史視野下的土耳其革命與變革——以民族主義、獨立革命與世俗化為例”，*社會科學戰線*2019(3)，pp.94-113。

周家彬與陳奧. 2021, “試論中共對領導工人階級方式的探索(1925—1927)——以上海區委對工會的領導為例”，*人文雜誌*2021 (11)，pp.97-107.

戴國輝. 2011, “兩本「遺著」——尾崎秀實與瞿秋白”，載林彩美. *戴國輝全集* (第17卷)，台北：文訊雜誌社，pp.75-80.

羅福惠. 2000, “蘇俄(聯)對孫中山的援助為何既遲又少？——兼論土耳其民族運動的陰影”，*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2)，pp.43-51.

